

論語序說

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

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

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

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

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

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爲司職吏

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爲犧義與牝同

養犧牲之所此官卽孟子所謂來田

論語序說

論語卷之三

朱熹集註

公治長第五

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

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如

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

○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

也以其子妻之

莫去登下同釋力
逆反纆息列反

公治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

縲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巨

先秦文学与文化

第二輯

趙達夫 主編

甘肅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詞語序說

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
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
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
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
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
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爲司職吏
思職兒周禮牛人讀爲犧義與牝同
養犧牲之所此官卽孟子所謂來田

論語卷之三

朱熹集註

公冶長第五

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
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
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

○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
也以其子妻之

妻去聲下同
縲力追反縲息列反

先秦文学与文化

第二輯

趙達夫 主編

甘肅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先秦文学与文化. 第2辑/赵逵夫主编. —上海: 上海
远东出版社, 2012

ISBN 978-7-5476-0644-5

I. ①先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古典文学
研究—先秦时代—文集②文化史—中国—先秦时代—
文集 IV. ①I206.2-53②K220.3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72346 号

责任编辑: 鲍广丽

封面设计: 李 廉

先秦文学与文化 第二辑

主编: 赵逵夫

出版: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

地址: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

邮编: 200336

网址: www.ydbook.com

发行: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

制版: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

印刷: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

装订: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

版次: 2012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90 × 1240 1/32

字数: 288 千字

印张: 10

ISBN 978-7-5476-0644-5/G · 464 定价: 30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62347733)

如发生质量问题,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

零售、邮购电话: 021-62347733-8555

顾 问 饶宗颐 汤一介 李学勤 裘锡圭
 夏传才 谭家健 崔富章

编 委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长华	王 辉	王 锸	王震中
方 勇	方 铭	过常宝	伏俊琰
刘跃进	刘毓庆	池万兴	李炳海
汪受宽	张文轩	张崇琛	张新科
林庆彰	罗家湘	周玉秀	周建忠
郑杰文	赵生群	赵逵夫	祝中熹
贾海生	晁福林	徐正英	徐志啸
郭建勋	彭 林	韩高年	傅道彬

主 编 赵逵夫
执行编辑 马世年

目 录

十年来先秦散文研究巡礼 / 谭家健 (1)

先秦文论四题 / 赵逵夫 (12)

黄帝战胜末代炎帝及蚩尤的纪功之辞

——《仓颉书》试释 / 张崇琛 (46)

中华文明的重要渊源

——先秦陇文化 / 汪受宽 (67)

伏羲文化精神的现代意义 / 胡政平 谢增虎 (80)

先秦时期文化多样性观念的自觉之路 / 韩高年 (94)

三百篇的经典形成：论孔子、孟子在《诗经》

学史上的意义 / 黄忠慎 (106)

他山之石：日本近十年(2001-2010)的

《诗经》学研究 / 张文朝 (120)

楚辞在二十世纪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/ 徐志啸 (134)

“楚声情结”与汉代楚歌体诗的盛衰演变 / 马世年 (145)

论屈原《离骚》的忧患精神 / 武励兴 (160)

刘向《九叹》在汉代楚辞接受史上的重要价值 / 王 浩 (184)

文化保守与文化创新别解

——老子给我们的启示 / 莫 超 (198)

王安石《老子注》的体制与作时 / 罗家湘 (204)

由“杞、宋不足征”看孔子的文化遗憾与夷夏观念 / 张艳芳 (212)

《管子》校论 / 魏代富 (220)

先秦《诗经·文王》到《庄子·缮性》

“辘轳旋转”的书写艺术 / 钱奕华 (237)

利用出土文献校读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二则 / 张新俊 (247)

清代以来“共和行政”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述评 / 陶兴华 (259)

《山海经》中人猪组合的神人形象考论 / 梁 奇 (277)

刘安及淮南国宾客的著述 / 漆子扬 (285)

《列女传》十五卷本与八卷本的离合演变 / 陈丽平 (299)

十年来先秦散文研究巡礼

谭家健

(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)

内容提要 近十年来,先秦散文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绩,其中属于综合研究的专著便有六部。其共同特点是:试图突破作家作品论的框架,采用新的角度、新的理论思维、新的分析方法,对先秦散文从整体上重新审视。但也存在某些问题和弊端。本文即对相关著作予以评介,并由此论及当前先秦散文研究的走向问题。

关键词 先秦散文 研究动态 文学视角

近十年来,关于先秦散文综合研究的专著有六部,其共同特点是:试图突破作家作品论的框架,采用新的角度、新的理论思维、新的分析方法,对先秦散文从整体上重新审视,因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但其中也存在某些问题和弊端。下面按出版时序分别评介如次。

杨树增《先秦诸子散文——诗化的哲理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9年8月出版,26万字,分上下编。上编本体论,七章,论述六经之后先秦诸子体现出的散文新流向,先秦诸子扎根于大变革时代的土壤,沐浴着理性精神的光芒,诸子流派纷呈殊途同归,体现出哲学与艺术的高度结合,其体制经历了由语录体向专论体发展与成熟的过程。诸子散文是历史的也是未来的精神宝库。下编流变论,六章,论述:经世化民的箴言:儒家散文;满腔兼爱利天下:墨家散文;曼衍诗情抒追求:

道家散文；敷张扬历的辞令：纵横家散文；胸怀万方巧运筹：兵家散文；热血铸就治国策：法家散文。

本书首先从总体上概括出先秦诸子散文的七个要点，然后对先秦六家分别进行评说。上编的设置，属于宏观性质，多有创获。所论各点，既概括了他人研究成果，又融入自己的体会，立论公允，评述得体，有的裁断较为准确、稳妥，令人首肯。下编的分论，属于微观性质，但不同于作家作品论，对每家散文作综合评析，大致符合实际，不乏精辟之处。不过，这方面的工作，他人多有尝试。而具体分析，大多未能超越前人。

此书在结构上的不足之处是未能突出重点。上编七题，重点应在哲理与艺术的结合，这正是本书的副题，似乎尚未充分展开。下编论六家。重点应该是儒道两家，似可多用笔墨。

有的评论者认为，此书似乎对先秦诸子提出新颖的认识，尝试新的把握方式，但从具体论列看，实在是“换汤不换药”。这样讲未免要求过严。

傅修延《先秦叙事研究：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》，东方出版社，1999年12月出版，24万字，共七章。第一章绪论，叙事学的背景与意义、对象与方法；第二章，先秦叙事的工具：结绳、刻契、图画、文字，认为汉字的构成已包括叙事的内容；第三章，论甲骨问事，青铜器铭事；第四章，论《易经》隐事，谣言记事，《诗经》感事，着重分析《诗经》消费形态，《诗经》之史诗，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，《诗经》对叙事学的贡献与影响；第五章，论《山海经》的静态叙事与神话思维，《尚书》的记言与论事，《春秋》的记言与立法，《左传》之史已有诗衣，其记言与记事均衡结合，文本与故事均衡对称，事实与虚构交融互渗，叙事主体的活跃与编年史体的桎梏；第六章，诸子言事的繁荣，着重分析其语言艺术攀登高峰，寓言故事蔚为大观，民间文艺登堂入室；第七章，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。

对于傅氏此书，董乃斌在序言中给予高度评价：一、迄今为止大多数叙事学论著都以小说为主要对象，而傅氏则将一切“有秩序的叙述”的行为均视为叙事。其论述对象突破了文学的范畴，雅俗一体，史稗无

分,韵散同举,三环(文学的产生、传播、消费)连锁,这就不但大大扩展了视野和取证范围,而且有利于对叙事行为作追根究底的研究。二、全书逻辑严谨地检视和叙述了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过程,从初民的叙事工具讲起,依次论析甲骨文、金文、《易经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山海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战国诸子散文中的寓言等在叙事学中的价值和各自特色,令人信服地得出中国叙事传统形成于先秦时期的结论。三、本书论析善于抓住各个对象的特点,紧扣叙事这个主题,而又不拘泥局促,在翔实资料的支持下,随处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论点,标志傅氏叙事学研究攀登上一段新阶,也预示他的研究有非常广阔的前景。

常森在《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反思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2年出版)中,首先肯定傅著是新中国建立以后,先秦散文研究方面最有探索意义的成果,对先秦叙事文做出了很多极具启发意义的解读。立论虽根于借鉴他山之石,但从先秦散文研究方面看,独到,深刻,细腻,对认识卜辞、铭文、史传、诸子的特点,对把握先秦散文、先秦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,提供了具有深远启示意义的观点和视角。常森同时指出,傅著的缺失非常鲜明,首先,其叙事学观念似乎还存在含糊不清的地方。例如,先秦诸子散文的主旨自然是在记言,但傅氏对叙事、记言关系的把握则有相当程度的混乱。其次,傅氏把握先秦散文的整体理念依旧是沿袭传统的看法,把文学视为史学或哲学的附庸,或者次一级、低一级的概念。其三,傅著在很多地方以叙事学之新鲜名头来转述或演绎传统的观念。其四,更重要的是,傅著很多根本性论断缺乏实证,这极大地削弱了结论的科学性。著者不仅未对一些论断提供实证,而且根本无意于证明这种关系的确实性。

我认为,傅氏的《先秦叙事研究》,其基本理念是80年代以来从国外引进的,运用于研究小说、史传文学乃至叙事诗是可行的,在微观分析方面取得一定成绩;然而,傅氏把它扩大到几乎所有先秦文学领域,显然凿枘难合。最突出毛病在于把记言与叙事混同,把诸子散文全部当叙事文学来看待,难免给人以牵强附会之感。叙事学有四要素: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的过程。准此,诸子散文中,除少量寓言故事之外,

是不能算叙事文的。《尚书》的文章,除《金縢》、《顾命》等少数几篇外,也是不能算叙事文的,这是学界的共识。傅氏把荀子《成相》篇当成叙事文,还说“荀况的叙事学贡献是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”;说《山海经》的神话思维模式普遍地影响了后世叙事文学的叙事思维,说《山海经》对神怪外部特征的重视,移到文学上就是注重对人物外形的撮要描摹。此类论断经不起实证检验,难以令人信服。傅氏将一切“有秩序的记述行为”均视为叙事,不管是否具备叙事四要素,也不分是叙事还是说理、抒情、写景,这样无所不包的叙事学,实际上已泛化成写作学的代名词。

饶龙隼《先秦诸子与中国文学》,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2002年出版,40万字。全书分导言、上编、中编、下编。导言从人群变动和学术演变两条主线,考述先秦诸子的产生及进程,上编考述先秦诸子的文学创制活动,包括讴歌啸咏、创制篇什和设为寓言等方面,以显示中国早期文学的创造精神、演述体制、文辞体式、传写形制和用象形义;中编考述先秦诸子的前文学批评活动,包括诸子《诗》说、诸子神怪论和诸子“小说”观等,以展示古代文学观的前状态,即实用精神、神怪思想和学术变态;下编考述先秦诸子的用象制度及形态,包括观念具象的演变历程、基本特征和语言形式等内容,以探寻诸子时代的具象思维状态和言意操控能力。

此书给人突出印象是强烈的全面创新意识。其研究角度、思维方式、基本理念和使用概念、范畴,皆与众不同。最新之处是“把文学视为一种制度和一种制度下的活动”,文学作品乃“此制度与活动的产物”,以此观念统摄全书。

黄霖的《评饶龙隼〈上古文学制度述考〉》(《文学评论》2010年2期),说“将制度引进到文学领域之中,无疑熔铸着一种创新精神”,这是“饶先生在长期研究深入思考的基础上,从中国文学的通变实况中抽绎出来的,因而是具有充足的理据和独特的识见”。“作者翻遍了考古发现、原始宗教、神话传说、民族遗存、殷墟甲骨、殷周金文和群经诸子及其传释疏证,并注意吸取近代研究成果,辨析决疑,故所得结论令人信

服。”这些评价也适用于饶氏的《先秦诸子与先秦文学》。

然而,据我所见所闻,有些读者对饶氏之基本理念表示怀疑,认为所谓“文学制度”这一术语难以接受。饶氏把“文学制度”的内涵,定义为包括创制精神、文学体制、传写形制、用象制度、言说形式、前文学观念等。我认为,所谓“文学”,在先秦之含义并不明确,何谓“文学”何谓“非文学”不容易划分。所谓“制度”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定义为“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”。我的理解,是由社会上层统治者制定而被社会普遍遵守的带有刚性的规则。在先秦,有宗法制、赋役制、礼制、乐制、兵制、官制……而未闻有文学制度之说。秦有语法而未必有语言制度,有音韵而未必有用韵制度,有各种文体而未必有文体制度……至于观念、精神,很难加以制度化。饶著所谓“文学制度”内涵,多数可以理解为社会习惯、不成文的规则或潜规则,集体意识或无意识的意识,是人们约定俗成,习以为常,不自觉地形成的,而非自上而下颁布推行的,语言、歌谣即是如此。以文体而论,格律诗、词牌、曲谱、应用公文、八股文,才是制度化的产物。而在先秦时代,不论《诗经》体、楚辞体、史传体、诸子百家文体,尚无根据说它们是什么人制定的。后人可以从先秦文学活动中总结出某些规律,从复杂的个别现象中抽绎出其共同性,可以而且应当运用现代概念、术语加以概括。但是,这种概括应该有充分事实根据和学理依据,应是准确得当,严肃而慎重的,否则难以成立。

饶先生明确地对学界提出挑战。他说:“我引入文学制度观念,是对上古文学研究的实验。这样的学术实验是有挑战性的。不仅要面对上古文学自身规定性的壁垒,还要反思批判近世中国文学研究的利弊。因其壁垒,所以就要抱定攻坚必破的决心,切实考述上古文学制度的基本内涵。因其利弊,所以就要秉持精诚平允的态度,零点评估近世文学研究的相关成果。切实考述和零点评估,这就是我的学术旨趣。”(饶龙隼《上古文学制度述考》,17页)竟把近世文学研究相关成果评估为零,口气令人惊讶。

饶著使用了大量新的术语,用得最多的是“具象”。作者声明不赞成用“形象”、“意象”、“兴象”、“象征”。他特别提出“具象”一词,其中又

分为“原型具象”、“介质具象”、“观念具象”、“叙事性具象”、“感兴具象”、“复合型观念具象组合”、“单元型观念具象组合”等。实在不好理解,难免故弄玄虚之嫌。有时甚至舍平易而用艰深,例如把从神灵发展为神怪,称为“神怪逸出”,读者很可能以为是神怪从什么地方逃逸而出。还有“隐开”、“冥一”、“向度”、“气感取象”等,均属生造词语,不知其确切含义是什么。

书中有些具体分析论断与原文大相径庭。111页说:“墨子又是厌弃书籍的始作俑者。”他所根据的《墨子·贵义》篇原文是:“子墨子南游使卫,关中(车厢)载书甚多。弦唐子见而怪之,曰:‘吾夫子教公尚过曰:揣曲直而已。今夫子载书甚多,何有也?’子墨子曰:‘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,夕见七十士。故周公旦佐相天子,其修(治)至于今。翟上无君上之事,下无耕农之难,吾安敢废此?翟闻之,同归之物,信有误者,然而民听不均,是以书多也。今若(公尚)过之心者,数逆于精微,同归之物,既已知其要矣,是以不教以书也,而子何怪焉?’”墨子明确地肯定自己不废书,学习周公旦朝读书百篇,因而出门载书甚多。至于不要求公尚过多读书,是因为他对事理通达精微,天下殊途同归之物,已知其要领,就不教他多读书了。显然,这是因材施教的个案,不能得出墨子厌弃书籍的结论。

112页说:“孟子崇尚古乐,反对新乐(即俗乐、新声)。”根据是《孟子·梁惠王》下:齐宣王说:“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,直好世俗之乐耳。”孟子说,这没有关系,“今之乐由古之乐也”。杨伯峻《孟子译注》译为:“无论现在流行的音乐,或者古代音乐都是一样的。”又《孟子·尽心下》记,高子对孟子说:禹之音乐高于文王之音乐。你看禹的钟纽使用得都快断了。孟子认为,那是使用的时间长造成的,不是高低之别。可见孟子并不认为音乐越古越好。112页说:“孟子对当代讴歌啸咏不感兴趣,对其中蕴涵的审美情趣亦缺乏体认。”此论不确。《孟子·离娄上》引用沧浪之歌并对含义大加发挥,怎么能说孟子对讴歌不感兴趣呢?

程水金《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——先秦散文发展线索探寻》,

第一卷,武汉大学出版社,2002年11月出版,49万字。第二卷,2004年7月出版,53万字。此书分为三编:第一编,巫卜文化与巫卜散文,分三章论述甲骨卜辞、《周易》筮辞;第二编,史官文化与史官散文,分八章论述殷周铜器铭文、《尚书》、《逸周书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等书;第三编,士人文化与士人散文,分四章论述老子、孔子、墨子。按照作者计划,还将有第三卷、第四卷,分别论述先秦其他诸子著作。

本书力求考证辩驳与理论阐述相结合,宏观与微观相结合。对所论古籍,先大量收集疏理前贤有关资料,加以比较,剖析折中,取长去短,而后铸成己意,可谓剔抉入微,新见迭出。宏观概括,亦不乏精彩的卓识。有不少篇幅似乎是文字和概念考释,实质上是探求其历史根源和文化内涵。作者知识面比较广博,思维相当细密,在近年来同类著作中不可多得。例如:把《尚书》的主旨概括为搜缀既往,寻觅古鉴,《逸周书》体现出从援例鉴古到历史经验的条理化(此说极精到,实发他人所未发)。《春秋》及三传目的在反思历史探求公理。遵循时间——因果律,显现出理性精神。老子是由史官而退为隐者,其文化特征打上双重烙印。对老子的“道”与孔子的“道”作出细密的比较。以专章考论孝、礼、仁三个范畴,构成儒家君子的人格与圣贤气象。又指出学、思、口三者是《论语》的文化内涵,从个性、情感、理趣分析孔子的人间情怀和《论语》的文体风格。对墨子的十大主张也分别作具体的评论。

最令人欣赏的是关于老子与孔子的比较。2卷243页说:“为了消除日趋紧张的人文对峙,摆脱历史困境,老子设计了两套相辅相成的方案,一是尽量削减人伦规范以至于放弃一切人文举措,采取无为无事的施政方略;一是杜绝人的一切私欲,彻底消除人文对峙的总根源。”479页说:“孔子同样感受到社会危机与道德堕落,但与老子相反,孔子认为,削减人伦规范以至于放弃人伦举措,并不是解决社会危机,消除人文困境的有效方法。恰恰相反,重整既有的人伦规范,改良既往人文传统,则是匡济现实人心,整顿社会秩序的救世良方。因此,孔子并不像老子那样,具有深沉博大的宇宙情怀,也没有老子那样整体的历史批评观念。其思想发生过程,是由当下社会政治秩序的批判,进而重建理想

的道德价值体系。”此类宏论，书中随处可见。

此书也有明显不足。第一，还不是真正的散文研究，而是以思想文化研究为主体，关于文体特征、修辞技巧、写作经验乃至语言艺术等，语焉而不详，没有下太大气力。正标题是符合书的实际的，副标题则未充分体现出来。第二，此书多有卓论，但仅是“点”，而未构成“面”和“线”，对所论每本书或每位思想家，未作全面评析，只是抽取几个问题来讲。各章之间看不出有机联系。此书属于散论、丛论，而不是“史论”，更不是“史”。第三，作者或许过于求新立异，立论有时过于勇敢而欠周密，难免有片面性。墨子一章尤其明显。如说：“墨子的目标，是要将旧贵族统统赶下台，颇有阿 Q 革这伙妈妈的命的意味。”（2 卷 541 页）“墨子的尚贤、尚同的主张，虽然并没有明倡暴力革命，而实质上即蕴涵着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意识。”（2 卷 543 页）“毫无疑问，墨子要在社会底层选拔一班农与工肆之人，使之成为新的贵族，以取代旧的贵族，并将旧的贵族废为奴隶。”（2 卷 542 页）这是没有根据的抬高。另外有些地方又评价过低。2 卷 639 页说：“从总体上看，墨子的道德观与伦理观，表现出‘有用即真理’的功利主义色彩，其方法论也体现出‘感觉即实在’的经验主义倾向。”把“有用即真理”，“感觉即实在”这些西方哲学帽子扣在墨子头上很不适当。2 卷 565 页说：墨子“这种爱，类似于商业行为中的等价变换。因此，墨子之所谓兼爱，实质上就是互利”。认为“郭沫若说墨子并不重在爱人，而是重在利己，虽然偏激，也不无道理”。作者似乎忽视了墨子“摩顶放踵，利天下，为之”，以及后期墨家讲的“杀己以存天下”，“爱人非为誉也”，墨家之徒为了实践“义”，具有“赴汤蹈火，死不还踵”的牺牲精神。怎么能说墨子“重在利己”呢？

从引证和讨论的对象看，此书重视古人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见解，很少提到近 30 年的著作。由于作者未能充分吸收最新成果，对于某些已经进一步深化了的问题，其分析评论似乎显得滞后。

张群《诸子时代与诸子文学》，齐鲁书社，2008 年 12 月出版，22 万字。第一章，从诗到思，文化视野里的诸子散文。第一节，论诗人时代与中国早期文化的诗性特征；第二节，理性文化的勃兴与散文时代的到

来,认为早期主要是史官文化,而后发展为士人文化,由哲学的独立发展为哲理散文的独立;第三节,论诸子散文的文体演进;第四节,论诗性文化在诸子散文的文体演进;第四节,论诗性文化在诸子散文中的余响,认为《老子》是诗化的哲理散文,《论语》是诗意言说,《庄子》反映一位哲学家的诗意人生。第二章,文学与象征,诸子文学的艺术表现。第一节,论“文”的观念的出现和“文言”的诞生;第二节,论“立象以尽意”的意象思维;第三节,论象征与诸子文学中的意象,着重分析“比德”说与玉、山、水、松柏等意象。第三章,骋辞驰说的诸子说理散文。第一节,论诸子说理艺术,着重分析归谬法和比喻、寓言的运用;第二节,诸子对说理文的开创之功。第四章,诸子寓言。第一节,诸子寓言的产生及意象思维特征;第二节,诸子寓言的发展历程;第三节,论庄子的泛寓言。第五章,诸子时代的文艺思想。第一节,诸子的“文学”观;第二节,儒墨文艺思想之比较;第三节,以大为美的抽象美学观念萌芽于诸子时代。第六章,儒道诸子与中国文学。第一节,孟子与中国文学;第二节,老庄对古代文论的影响与贡献;第三节,儒道互补与中国古代文人的哲学;第四节,先秦诸子与古代文体,着重论述连珠体和荀子的诗体与赋体。

本书立足于诸子所处时代的政治状况和哲学思想的发展,揭示文化发展对文学的影响,结合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分析,描述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下的诸子文学的原生状态,探索时代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。作者力图从文化论文学,重点还是处处紧扣文学,没有离开文学专门另论文化。思想清楚,概念明确,立论平实,不刻意求新,梳理前人而后出以己意,态度认真而诚实。第一、二、三章比较好,第四、五、六章稍嫌平淡,有些观点是别人讲过的,超越不多。全书的“文化”观,主要是史学与哲学,而对宗教、艺术、民俗等注意不够。关于寓言的论述,前后有些重复甚至夹缠,有时把寓言和比喻、引证以及真实的历史故事等混合在一起(饶龙隼的书也有这种现象),给人以寓言的范畴过泛之感。

过常宝《先秦散文研究——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》,人民出版社,2009年7月出版,45万字,共八章。第一章,论商周巫卜文献:

甲骨卜辞,图象文献和易占卦爻辞,象征与阐释;第二章,论西周礼教文献:铭文与盟诅辞,神道设教与周初八诰,仪式追溯和典谟制度及《尚书》文章;第三章,论春秋史传文献:《春秋》书法、《左传》叙事逻辑、虚饰与实录;第四章,论春秋时代之“语”类文献:春秋君子文化,《国语》与君子立言、《老子》与箴戒之“语”、《论语》语录体的意义;第五、六、七章,论战国诸子文献:《礼记》与儒学传承方式,《墨子》之论辩、《孟子》与师道传承、《庄子》与优语、《荀子》的文章体制和文学观念、《韩非子》的文体、参验法和辩难术、《说林》和《储说》;第八章,战国策士文献:分析《战国策》的语言方式及寓言。

本书从文化发展的大视角出发,对先秦散文文献作文体探源、文体功能及文体演变的研究。作者认为,所谓文体,即文本的形式和表达方式,主要受到话语权力所赖以生成的文化形态的影响,至于文本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倒在其次。本书的基本观点是:先秦时期正是文化、政治、官制、社会习俗等急剧变化发展的时期,不同文化层面的信仰、传播、组织方式,不同社会阶层的职事、行为方式等,都对文献本身产生影响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,不但甲骨卜辞,易卦爻辞,史传文献,诸子散文,纵横家说辞,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和文化功用,而且,每一类文献内部的不同种类文本,如《尚书》中典、谟、誓、诰、训、命等,史传散文中的经和传,记事体和记言体、《周易》中的卦爻辞和大传、系辞等,都有不同的文化意义,其文体形态受文化功能的制约。

本书在以下几方面有重大突破:一、在宗教文化向理性化过渡的大背景下,通过对不同层次文化的社会功能、表达方式、实现途径等作细致深入的研究,揭示它和各类文献之间的深层关系;二、对文献创制者的职事、言说范围及言说方式进行详密的考察;三、进一步探索不同文体的功能,并对其文化地位及对后世文学观念的影响做出判断。四、描述各种主要散文文体的形式特征、文章原义和相互间的继承及影响关系。

本书的基本理念范畴和论述方式既不是从国外引进的,也不是重复中国的旧有传统,而是把近三十年来文化研究的观点方法与古代文化活动有机结合,充分尊重并努力吸收近三十年的相关研究成果,并在

注释中作出详细交待,即使片言只语也不含糊,这种认真精神十分可贵。本书的许多结论,既新颖独创,又能令人理解,乐于接受,不少地方,精彩透彻,妙语迭出,使人击节赞赏。立论有相当理论深度,但并不玄奥,较好地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接。全书结构有序,要言不烦,重点突出,论析充分,较少繁词浮论。在近十年的同类著作中堪称特出。

本书不足之处是:各章之间有些夹缠,有的话前面讲过后面又重复,有些例证循环使用。本书不再分论思想性、艺术性是可以的,但对各种文献之不同思想价值,不同美学效果和不同修辞风格个性,比论不够。本书的主旨实际上是先秦文献文化演进之研究。既然用“先秦散文研究”为题,应在文学研究方面有所加强,文化研究并不能代替或完全涵盖文学研究。

综观十年来先秦散文研究的几部专著,不难发现其共同追求是,把文化研究引入文学研究,这与近三十年来大的学术趋势有关。比起三十年前以政治论文学是一个进步,比上世纪90年代前期着重于写作艺术和文本研究,也有所深化。但是,所谓文化研究的范围尚不确定,先秦时期文史哲不分,几乎所有先秦古籍都具有文化价值,先秦散文著作如何找准自己的位置?从文化史角度阐发,怎样与思想史、哲学史、史学史相区别?都值得探讨。我以为,既然称之为先秦散文,应该属于文学范畴,应当以文学性为主,分析其形象思维、艺术手法、修辞技巧等,从中发掘出美学内涵。文学史家不是去占领哲学史研究、史学史研究的地盘,而是要深耕细耘自己的园圃。可惜,从清代起,重考据,轻义理,鄙薄辞章之学的风气,沿袭至今。今天,我们在积极开拓文化研究的同时,如何推动先秦散文的研究回归到文学的本题上来,似乎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。

■ 作者简介

谭家健(1936—),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,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。